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

流变与会通

中西诗乐美学释论

王柯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

流变与会通

中西诗乐美学释论

王柯平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变与会通：中西诗乐美学释论 / 王柯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1747-4

I. ①流… II. ①王… III. ①诗歌美学—研究—中国 ②诗歌美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207.2 ②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4903 号

书 名：流变与会通——中西诗乐美学释论

著作责任者：王柯平 著

责任编辑：张文礼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1747-4/I • 255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307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序

在西方，从学科发展史上讲，先有探讨文艺理论与批评鉴赏的诗学（poetics），后有研究感性知识与审美规律的美学（aesthetics）。前者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代表，后者以鲍姆嘉通的《美学》为标志，随之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和谢林的《艺术哲学》为津梁，由此发展至今，高头讲章的论作不少，称得上立一家之言的经典不多，能入其列者兴许包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丹纳的《艺术哲学》、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克罗齐的《美学纲要》、柯林伍德的《艺术原理》、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卢卡奇的《审美特性》、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等。

在中国，传统上诗乐舞三位一体，琴棋书画无诗不通，所谓“诗话”、“词话”、“乐论”、“文赋”、“书道”与“画品”之类文艺学说，就其名称和内容而言，大抵上与西洋科目“诗学”名殊而意近，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儒典《乐记》、荀子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至于“美学”这一舶来品，在20世纪初传入华土，因其早期引介缺乏西方哲学根基和理论系统，虽国内涉猎“美学”者众，但著述立论者寡，就连王国维这位积极钻研西学、引领一代风气者，其为作跨越中西，钩深致远，削繁化简，但却取名为《人间词话》，行文风格依然流于传统。这一遗风流韵绵延不断，甚至影响到朱光潜对其代表作《诗论》的冠名。迄今，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众，出版物多，较有影响的有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与《西方美学史》、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邓以蛰的《画理探微》等。至于中国意义上的美学或中国美学研究，近数十年来成果渐丰，但重复劳动不少，食古不化风盛，在理论根基与创化立新方面，能成一家之说者屈指可数。相比之下，

理论价值较为突出的论著有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与李泽厚的《美学三书》等，其余诸多新作高论，还有待时日检验，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面对国内上述学术现状，既没有必要急于求成，也没有必要制造某种民族性或政治化压力进行鼓噪，更没有必要利用现代媒体进行朝慕“新说”、夕伐“假论”之类的戏剧性炒作，因为那样只能产生焰火似的瞬间效应，非但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推进，反倒招致自欺欺人、自我戏弄的恶果。我们以为，“非静无以成学”。这里所言的“学”，是探究经典之学问，是会通古今之研究，是转换创化之过程，故此要求以学养思，以思促学，学思并重，尽可能推陈出新。不消说，这一切最终都要通过书写来呈现。那么，现如今书写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会涉及哪些相关要素呢？

我们知道，传统儒家对待治学的态度，总是将其与尊圣宗经弘道联系在一起，故有影响弥久的“述而不作”之说。但从儒家思想的传承与流变形态来看，所谓“述”也是“作”，即在阐述解释经典过程中，经常会审时度势地加入新的看法，添入新的思想，以此将“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任务落在实处。相比之下，现代学者没有旧式传统的约束，也没有清规戒律的羁绊，他们对于经典的态度是自由而独立的，甚至为了达到推翻旧说以立新论的目的而孜孜以求，尝试着引领风气之先，成就一家之言。有鉴于此，为学而习经典，“述”固然必要，但不是“述而不作”，而是“述而有作”，即在“述”与“作”的交叉过程中，将原本模糊的东西昭示为澄明的东西，将容易忽略的东西凸显为应受重视的东西，将论证不足的东西补充为论证完满的东西……总之，这些方面的需要与可能，构成了“述而有作”的书写空间。如今大多数的论作，也都是在此书写空间中展开的。列入本丛书的著译，大体上也是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述而有作”是有一定条件的，这需要重视学理（academic etiquettes），重视文本含义（textual meaning），重视语境意义（contextual significance），重视再次反思（second reflection），重视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对于学理问题，我曾在一次与会发言中讲过：从“雅典学园”（Akadeimeia）衍生的“学者”（academic）一词，本身包含诸多意思，

譬如“学术的、纯学理的、纯理论的、学究式的”等等。从学术研究和学者身份的角度来看，讲求学理（以科学原理、法则、规范和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学理），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伦理要求。就国内学界的现状看，以思想（而非一般的思想性）促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这需要具备相当特殊的条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近百年来，国内提得起来又放得下去的有根基的思想（理论学说）不多，真正的思想家为数寥寥。因此，对大部分学者而言，以学理促研究，在相对意义上是切实可行的。学术研究是一个逐步积累和推进的过程，国内的西方学术研究更是如此。经常鼓噪的“创新”、“突破”或“打通”等等，如若将其相关成果翻译成便于甄别和鉴定的英文或法文，就比较容易看出其中到底有多少成色或真货。鉴于此况，倡导以学理促研究，是有一定必要性和针对性的。这其中至少涉及三个主要向度：（1）学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借着用）；（2）理解与阐释的准确性（照着讲）；（3）假设与立论的可能性和探索性（接着讲）。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把研究做到实处，才有可能实现“创造性转化”或“转换性创构”（transformational creation）。

对于经典研读，我也曾在一次与会发言中讲过这样一段感言：“现代学者之于古今经典，须入乎文本，故能解之；须出乎历史，故能论之；须关乎现实，故能用之。凡循序渐进者，涵泳其间者，方得妙悟真识，终能钩深致远，有所成就。”

所谓“入乎文本，故能解之”，就是要弄清文本的含义，要保证理解的准确性。这是关键的一步，是深入研究和阐发的基点。这一步如果走得匆忙，就有可能踏空，后来的一切努力势必会将错就错，到头来造成南辕北辙式的耗费。而要走好这一步，不仅需要严格的学术训练，也需要良好的语文修养，即古今文字与外语能力。要知道，在中外文本文流通中，因语文能力不济所造成的误译与误用，自然会殃及论证过程与最后结论，其杀伤力无疑是从事学术研究和准确把握含义的大敌。

所谓“出乎历史，故能论之”，其前提是“入乎历史”，也就是进入到历史文化的时空背景中，拓宽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参阅同时代以及不同时代的注释评说，继而在“出乎历史”之际，于整体把握或领会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与论证进行分析归纳、论述评判。这里通常

会涉及“视域的融合”、“文本的互动”与“语境的意义”等时下流行的解释学概念。当然，有些解释学概念不只限于文本解读与读者接受的技术性方法，而是关乎人之为人的存在形式与历史意识间的本体论关系。因此，我们在解释和论述他者及其理论观点时，自己会有意无意地参与到自我存在的生成过程里面。此时的“自我”，经常会进入“吾丧我”的存在状态，因为其感受与运思，会涉及他者乃至他者的他者，即从两人的对话与体验中外延到多人的对话与体验中。在理想条件下，这一过程所产生与所期待的可能效应，使人油然联想起柏拉图标举诗性智慧的“磁石喻”。

所谓“关乎现实，故能用之”，具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在关注现实需要与问题的基础上，将相关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加以适宜的变通或应用，以期取得经世致用或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效果。其二是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再次反思，力求返本开新，实现创造性转化或转换性创构，以便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建构新的理论系统。譬如，牟宗三以比较的视野，研究宋明理学与康德哲学，成就了牟宗三自己的思想系统。海德格尔基于个人的哲学立场，研究尼采的哲学与荷尔德林的诗歌，丰富了海德格尔本人的理论学说。后期的思想家，总是担负着承上启下的使命，他们运用因革之道，吸收不同养料，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切都是在“入乎文本”、“出乎历史”和“关乎现实”的探索过程中，循序渐进，钩深致远，最终取得的成就。

在此诚望参与和支持本丛书的学者，均以严谨的学理和创化的精神，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读者诸君，以此抛砖引玉，促进批评对话，推动诗学与美学的发展。

借此机会，谨向出版资助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诚表谢忱！

以上碎语，忝列为序。

王柯平

千禧十一年秋于京东杨榆斋

前 言

近十余年来，我把许多时间花费在研习古希腊诗学与古代哲学方面。学界同仁周知，古典研究资料多，进展慢，然学理明，益处大。一旦入乎其内，自觉乐此不疲，其原因在于此过程涉及“以学养思”或“以思促学”两个向度，不至于使人堕入学术研究的“空门”。迄今，我仅出版了《〈理想国〉的诗学研究》一书，翻译了《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一卷《古代哲学》，另外撰写过十余篇关于古希腊诗学的中英文论文，已结集为《古希腊诗学遗韵》。因此可以说，我虽用功甚勤，但未取得值得称道的成果。现如今，我依然致力于思索柏拉图晚年的道德诗学与政治理论等问题。

当然，作为读书人，我对中国哲学、诗学及美学领域的问题，亦给予颇多关注，并写过一些文章，多用于国际会议，其后汇集在《中国文化精神》(*Ethos of Chinese Culture*)、《中国诗学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oetics*)与《中国人的思维》(*Chinese Way of Thinking*)等英文著作里。

集于本书中的文章，多属近年来的习作，其中有的译自发表过的英文原稿，有的载于国内的中文刊物，有的用于相关的学术论坛，有的则是新近整理出的参会文稿。所涉论题，或大或小；所述观点，或新或旧；所思程度，或浅或深；所行文体，或简或繁……如今一并呈现给读者诸君，诚望得到各位的雅正与指点。因为，此类论题将是我五年后倾力研究的部分内容。李泽厚先生旅居美国多年，深晓中国学术在域外的地位，故每次回国聚谈论学，均建议我多用英文著述，阐释中国思想的古今流变与发展。当年冯友兰先生倡导“阐旧邦以辅新命”，现今李先生更是如此。前辈学者的学术使命感，理当引起后辈学子的敬重与承接，尽管我本人能力有限，但无妨倾心而为。

本书取名为“流变与会通”，意在探寻中西诗乐美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流变，同时试图表明其研究方法与运思过程的会通特征。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各种思潮不断引入华土，传布广泛，影响甚巨，国内学者无论自觉不自觉与否，已然形成一种跨文化视域（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其思索与论说大多往返于中学与西学的比较与会通之间，抑或偏重中体西用，抑或推崇西体中用，抑或强调中西互补，虽然方略重点有异，但其主要目的相似，均旨在解决中国文化、社会、教育、政治、经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最终实现文明德兴、国富民强、走向世界的理想追求。

有鉴于此，令人油然想起唐人孟浩然《与诸子登岷山》所赋诗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不过，此诗在俯仰古今、登临胜迹、追怀先贤之际，其后四句（“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所表思绪，给人以时过境迁、怀古伤情、寄慨苍凉之感，与我们复读和重估古哲先贤的诗话理论与美学思想迥然有别。要知道，后者引发的反思与对话、比照与创化，给与的多是情思意趣所滋生的精神愉悦和知性收获。而且，其中许多玄妙的内涵、创构的热情、超越的灵思，使人在饱受启迪的同时欣然而乐，无限神驰。故此，我有意舍弃孟诗的后四句，而取王维《酬张少府》一诗的后四句代之——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自不待言，此等偷梁换柱之法，谨在表达个人的某种心境。我猜想，不少乐于此道的同仁，亦有些许类似的感受吧！

王柯平

2011年秋于京东杨榆斋

目 录

“诗学与美学研究丛书”序	1
前 言	1
一 孔子诗教思想发微	1
1. 独特的社交话语	1
2. 多重性的审美话语	6
3. 双向式的伦理话语	21
二 孔子与柏拉图论乐	26
1. 心理效应	27
2. 审美价值	29
3. 道德功能	32
4. 政治期待	37
5. 教育作用	40
6. 同异比较	45
三 墨子与荀子辩乐	49
1. 墨子的消极功利主义	50
2. 荀子的积极功利主义	54
3. 对两种对立观点的反思	59
四 朱熹的道德化诗学观	63
1. 先验道德原则的确立	64
2. 对“思无邪”的二次反思	68

五	《文心雕龙·明诗》篇三议	74
1.	文体流变:体式与风格	74
2.	艺术创生:折衷与求通	78
3.	风格范式:自然、雅润与清丽	82
六	禅悟中的诗性智慧	87
1.	自然景象的启示	87
2.	自然而然的心法	90
3.	诗化的修禅之道	94
4.	空灵为美的境界	100
七	模仿论与模写说辨析	103
1.	模仿与真实性层级结构	104
2.	模写与渐进式修为过程	110
3.	同异有别的比较分析	118
八	境界“为探其本”的深层意味	123
1.	何谓“为探其本”	123
2.	“能观”之“观”的特征	127
3.	直观观念论的启示	132
4.	审美观念论的影响	137
5.	“为探其本”的深层意味	143
九	《摩罗诗力说》与摩罗式崇高诗学	148
1.	《摩罗诗力说》的历史地位	148
2.	摩罗诗派与摩罗的寓意	151
3.	破旧立新与摩罗式崇高	157
十	方东美的文化理想观与跨文化探索	169
1.	文化理想与九层塔喻	170
2.	跨文化探索与转化型超人	173
3.	二次反思与三重性历程策略	178
十一	阿多诺的批判美学理论	186
1.	文化产业的流弊	188
2.	现代艺术的特殊职能	190
3.	自律性与社会性的张力	194

4. 未来美学的发展前景	202
十二 挪用与建构中的文化诗学	207
1.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208
2. 新审美主义的文化诗学	210
十三 美育的游戏与会通之道	215
1. 目的性追求	216
2. 健全的艺术感觉	217
3. 生态式艺术教育	219
4. 跨学科的综合实践	220
5. 古典教育范式的启示	223
6. 理论假设的意义	225
附录:问题与断想	228
1. 诗化哲学与文体小议	228
2. 中国古典美学文本的翻译问题	232
3. 符号论美学与艺术哲学问题	236
4. 美学与道德问题	240
5. 美学研究中的可能缺漏	243
6. 艺术鉴赏与敏悟之道	246
7. 当代艺术中的“恐怖主义游戏”	254
8. 跨文化美学片议	257
9. 实践美学:论辩与真理	261
主要参考文献	266

一 孔子诗教思想发微^①

在《春秋左传》和《论语》等古籍中，赋诗、献诗、歌诗与引诗甚为频繁。诸如此类的历史文献表明，诗歌因其民俗、风情、政治、社会、审美和道德等内涵而盛行于古代中国。诗歌如此盛行的原因，主要在于它一般表现为三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即社交、审美和伦理话语形式，各自都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和教育等实践活动之中。故此，孔子所倡导的诗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温柔敦厚”的原则对上述三种话语形式的探讨。

1. 独特的社交话语

古时，在饮宴与祭祀等重大社交场合，诗歌作为一种社交话语（social discourse）经常以配乐演唱形式被广泛应用。据《左传》所载，当时的文人仕族，在日常会友、文化娱乐、论辩引证，特别是外交往来等礼仪活动中，惯于把诗歌当做彼此交流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念的表现性媒介。按夏承焘的统计与说法，“左传引诗，共134处；其中关于卿大夫赋诗的，共31处。他们有的拿诗来作为办国际交涉的辞令，有的拿它来作为官僚大夫间互相赞美或互相讽刺和规劝的工具，也有拿它揭发政治阶层的昏庸丑恶，为人民做呼吁、控诉的政器”^②。譬如，诗歌的外交用途可以通过《左传》所记叙的“郑

^① 此文译自英文稿“Confucius’ Expectations of Poetry”，首次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6年第4期。后来经过补充，以“Confuciu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rough Poetry”为题，在2008年7月首尔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宣读于“中日韩哲学论坛”。

^② 参阅夏承焘：《采诗和赋诗》，见林叶莲：《中国历代诗经学》（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第23页。

六卿饯宣子于郊”等事例得以彰显。此事上溯春秋时期鲁昭公十六年，即公元前 526 年，孔子当时约有 25 岁。席间，来郑国聘问的晋国使臣韩宣子请东道主“皆赋，起亦以知郑志”^①。其意是说，特邀在座的郑国大臣吟唱几首诗歌，以便从中窥探对方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不仅隐含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会表露出他们对待邻国的政治态度。对方每唱罢一首采自《诗经·郑风》中描写爱情的诗歌之后，如《野有蔓草》、《羔裘》和《褰裳》，韩宣子皆以应对的方式加以评论，以示自己的理解和欣赏。宴乐之声，盈盈于耳。郑国子游继而歌赋《风雨》，描写的是一位独守空房的夫人看到外出的丈夫顶风冒雨回家时的喜悦之情：

风雨凄凄，（风吹雨打冷清清，）
 鸡鸣喈喈，（屋屋鸡儿不住声，）
 既见君子，（盼得亲人来到了，）
 云胡不夷。（心头潮水立时平。）

 风雨如晦，（一天风雨黑阴阴，）
 鸡鸣不已，（为甚鸡儿叫不停。）
 既见君子，（盼得亲人来到了，）
 云胡不喜。（喜在眉头笑在心。）^②

曲终，另一位郑国大夫子旗紧接着唱起《有女同车》。该诗歌颂了新婚的姜家女子之美：

有女同车，（姑娘和我同乘车，）
 颜如舜华。（脸儿好像木槿花。）
 将翱将翔，（我们在外同遨游，）
 佩玉琼琚。（美玉佩环身上挂。）

① 参阅《春秋左传》，见《四书五经》（天津：古籍书店，1990 年），下册，第 451 页。

② 所有引诗及其译文均引自许渊冲英译《诗经》（汉英对照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年）。

彼美孟姜，（姜家美丽大姑娘，）
洵美且都！（确实漂亮又文雅。）

.....

其后，另一位在座的郑国上卿子柳接着唱起《箜兮》，描写的是丰收喜庆之时年轻女歌手邀请同伴载歌载舞的动人场面：

箜兮箜兮，（草皮儿，树叶儿，）
风其吹女。（好风吹你飘飘起。）
叔兮伯兮，（好人儿，亲人儿，）
倡予和女。（领头唱吧我和你。）

.....

歌赋至此，宴会气氛感人、其乐融融。国宾韩宣子通过聆听东道主唱和的诗歌，从中领略到了对方友善的意向。作为回应，他对所选唱的那些适宜这一外交场合的诗歌倍加赞赏，借以表达自己的欣快与感激之情，同时向他们赠送作为友谊标志的礼物——马匹，并以共鸣与答谢的方式，向东道主吟唱起雅颂之声《我将》：

我将我享，（我大献祭于明堂，）
维羊维牛，（用这肥牛与肥羊，）
维天其右之。（因为老天保佑它。）
仪式刑文王之典。（善用文王的典章，）
日靖四方。（天天谋求安四方。）

.....

合乎时宜或社交场合的歌赋表演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和谐的氛围更加浓厚，相互的理解与欣赏更为加深，彼此的友谊得到巩固，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得到加强，等等。《春秋左传》中所记载的类似活动，证实了陈景磐教授的下述见地：“吟唱的诗歌务必适合相关的情景，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些诗歌应能表达选唱者的意愿，与此同时，还要免伤其他在场人士的情怀。如果选唱的诗歌不当，通常会导致国

耻或国难。”^①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外交场合，双方以歌互答是一种特殊的交际或沟通方式。这不仅要求吟唱者精通诗歌乐律，而且要善于遴选、随机应变。所吟之诗既要表达歌者的意趣，也要免伤听者的情怀，借此取得皆大欢喜的效果。此时此地，吟唱诗歌能否达到应景作和、流畅自如的境界，便具有重大的政治、社交或外交意义。因为，选唱诗歌不当，往往会影响主客情谊或邦交关系，甚至“导致国耻或国难”。如《左传》成公二年，晋齐两国在鞍地交兵，晋胜齐败，齐宾媚人作为使节与晋人谈判，期间引诗折服晋人，结果使对方深受感动，化干戈为玉帛，不仅使晋不以齐国母后为人质，同时还使齐国免于其他灾殃。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流亡到秦国，贤臣赵襄助重耳赋诗应对得当，终于获得秦国相助，重返旧土。相反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齐国庆封出使鲁国，赋诗时因不知相鼠、茅鸱，结果贻笑大方，有伤国格；《左传》襄公十六年，齐国高厚出使晋国，因赋诗不伦不类，几乎酿成战祸。上述正反两类例证在《左传》中为数不少。

需要指出的是，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交话语形式，具有多种用途，如用于外交或谈论、写作或吟唱、公开或私下、随意或正式等不同的场合与活动。当然，适用诗歌的最好方法就是从中推绎出一定的思想或原理，随后再用来专对特定的情景。不消说，有些推绎结果多为读者或歌者主观所加，可能远离诗歌作者的原意，但在当时人们并不过于拘泥，而是惯于借用诗歌的含蓄性或隐喻性来满足特定场合中社会话语交往的需要。这恐怕也是中国文人历来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或“象外之致”的文化传统使然。其实，在《论语》里，孔子以推导或演绎之法来解释诗歌亦有多处。譬如，子夏引用《硕人》一诗中的几句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绘事后素。”子夏继而问道：“礼后乎？”孔子高兴地夸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孔子也曾以类似的方式鼓励国他的学生子贡，因为后者在读诗时善于从字里行间体会言外之意，进而能达到“温故而知新”的境界。不可否认，孔门阐释诗歌的方法，乍一看来确有牵强附会之嫌。然而，如果参照儒家

^① Chen Jingpan, *Confucius as a Teach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p. 329.

将美等同于内在的雅致与朴素性而非人为的修饰性这一观念，那么，从内在的逻辑上讲，上述那种引申式的解释也就不难理解了。确切地说，诗中所言的“素”，象征着那位女士天生的丽质，这对她的外在美具有本质意义。同样，在中国绘画中，“素”的背景对附丽其上的“绘”，具有相映成趣的本质意义和虚实相生的动态美学特征。内修的“仁”对外修的彬彬之“礼”亦然。由此可见，就理想的人格而论，孔子尽管一直强调内外双修或平衡发展，但似乎更注重内修或内在之美。

鉴于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社交话语形式的实际价值，孔子竭力勉励他的学生研习《诗经》，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方面旨在使他们于特定的社交场合恰如其分地用诗来应景作和，另一方面旨在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和讲话艺术。这当然涉及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就方法言，即从诗歌中推绎出某些隐含的思想观念，然后将其应用于特定的话语交往或外交场合之中；二是就目的论，孔子意在通过教育来培养一批合格胜任的政治家，在当时，有关诗歌的知识与实用技巧则是为政者从事外交等活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孔子告诫门徒，学《诗》是必修之课，是做人或修身的必要素材。据《论语》所载：

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季氏》）

不过，学《诗》或熟读《诗经》，与以各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来充分用《诗》相比，也只是诗教的初阶而已。诚如孔子所言：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显然，孔子倡导学《诗》的目的在于“学以致用”，即“用”于促进个人的修养和维护社稷的利益。这与孔子想把大部分弟子培养成合